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上册 (350~950年)

主 编 〔法〕罗伯特·福西耶 (Robert Fossier)  
译 者 陈志强 崔艳红 郭云艳 金彩云 罗春梅 吕丽蓉 马 巍  
吴舒屏 于 红 张春杰 张振海 赵康英 李秀玲  
译 校 陈志强



山东画报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上册 (350~950年)

主编 [法] 罗伯特·福西耶 (Robert Fossier)

译者 陈志强 崔艳红 郭云艳 金彩云

罗春梅 吕丽蓉 马 巍 吴舒屏

于 红 张春杰 张振海 赵康英

李秀玲

译校 陈志强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5-2017-158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350-1520 / (法) 罗伯特·福西耶  
主编; 陈志强, 李增洪, 李桂芝等译. - 济南: 山东画报  
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74-2532-9

I. ①剑… II. ①罗… ②陈… ③李… ④李… III. ①世界  
史-中世纪史-350-1520-图集 IV. K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8203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e Moyen Age (volume1): Les mondes nouveaux 350-950, second edition by Robert FOSSIER©  
Armand Colin, Paris, 1990*

*Le Moyen Age (volume2): L'éveil de l'Europe 950-1250, third edition by Robert FOSSIER© Ar-  
mand Colin, Paris, 1997*

*Le Moyen Age (volume3): Le temps des crises 1250-1520, third edition by Robert FOSSIER© Ar-  
mand Colin, Paris, 1997*

ARMAND COLIN is a trademark of DUNOD Editeur - 11, rue Paul Bert - 92240 MALAKOFF.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  
代理 ([www.divas-books.com](http://www.divas-books.com))

策划统筹 傅光中 杨 森

责任编辑 于建成 怀志霄

装帧设计 李海峰 杨建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mailto: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85×245毫米

108.25印张 630幅图 1955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16.00元 (上中下)

## 目 录

彩图目录	2
鸣谢	4
术语表	6
前言 (罗伯特·福西耶)	1
第一编 旧世界的断裂：395年至700年	15
第一章 剖析西部帝国：5世纪初期 [米切尔·鲁谢 (Michel Rouche) ]	17
第二章 西罗马的解体与蜕变：5世纪至7世纪 (米切尔·鲁谢)	50
第三章 东部历史的开端：5世纪初期 [埃弗兰·帕特拉让 (Evelyne Patlagean) ]	104
第四章 帝国的繁荣时期：5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 (埃弗兰·帕特拉让)	149
第二编 东部新世界的建立：7世纪至10世纪	181
第五章 从徙志模式到阿拉伯王国：7世纪至8世纪中期 [亨利·布雷斯克和比埃尔·吉夏尔 (Henri Bresc and Pierre Guichard) ]	183
第六章 阿拔斯王朝的世界，伊斯兰教的“鼎盛” (亨利·布雷斯克和比埃尔·吉夏尔)	226
第七章 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吗？7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 (埃弗兰·帕特拉让)	281
第八章 东方的复兴：9世纪中期至10世纪中期 (埃弗兰·帕特拉让)	337
第三编 欧洲的第一次繁荣：7世纪至10世纪中期	379
第九章 蛮族王国、基督教帝国还是独立公国？ (米切尔·鲁谢)	381
第十章 加洛林“复兴” (米切尔·鲁谢)	419
第十一章 欧洲的早期积累与收益：6世纪至9世纪 (米切尔·鲁谢)	476
主要参考书目	529
索引	551
译后记	599
再版后记	601

## 彩图目录

### 第71~74页

1. 爱尔兰金属制品，10世纪克卢西非松青铜板。克罗马克诺塞废品公司收集。
2. 日耳曼的帝国艺术。高脚玻璃杯，出土于5世纪初比利时维吕克斯-莫尔汗墓地。
3. 高卢的帝国艺术。“港口”镀金装饰银盘，来自4世纪中期恺撒奥古斯都宝藏（藏于罗马博物馆）。
4. 伦巴第人的艺术。约作于600年的镀金青铜头盔的正面饰板。展示的是登基国王阿吉卢尔夫（藏于佛罗伦萨，巴格罗博物馆）。

### 第143~146页

1. 负水罐儿的妇女。这幅5世纪创作的镶嵌画，取自君士坦丁堡大王宫的镶嵌画地板。
2. 男子头像。塞萨洛尼基圣乔治教堂（建于5世纪）穹顶镶嵌画细部。
3. 皇后塞奥多拉。意大利拉文纳圣维塔利安教堂（建于6世纪）唱诗班镶嵌画细部。
4. 圣母圣子像。这幅9世纪创作的金色背景的镶嵌画，位于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教堂半圆形后殿穹顶上。

### 第217~220页

1. 岩顶圆顶寺，耶路撒冷，穆斯林最古老的标准建筑，建于688年至691年。
2. 建于9世纪中期的凯万大清真寺喊塔。
3. 建于859年至861年的伊拉克撒马克的阿布·杜拉夫大清真寺著名的喊塔。
4. 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祈祷礼堂的柱子，西班牙，8世纪晚期至10世纪。

### 第311~314页

1. 圣西蒙长老苦修者修道院正面的主要拱顶，建于5世纪。
2. 建造于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教堂，中央穹顶、支撑墙和拱壁外观。
3. 6世纪建造的卡尔比·洛泽教堂的单一半圆形后殿和西面墙。
4. 卡帕多西亚的洞穴教堂（大约建于9世纪或10世纪）。

**第383~386页**

1. 拜占庭金器：查士丁二世的十字架（梵蒂冈，圣彼得教堂收藏）。
2. 由黄金、珐琅画、珍珠装饰的9世纪和10世纪的保加利亚人项链（藏于普里斯拉夫考古博物馆）。
3. 1世纪罗马圣餐杯，以磨光的宝石为杯体，镶嵌在10世纪拜占庭人制作的珐琅镶嵌的黄金基座上（藏于威尼斯圣马克宝库）。
4. 镶嵌瓷釉的福音书，描绘的是圣米哈伊尔，作于10世纪（藏于威尼斯圣马克宝库）。

**第457~460页**

1. 约840年的加洛林手稿，发现于蒙代尔-格兰多尔（藏于大英图书馆）。
2. 690年前后的爱尔兰手稿，摘自《圣威利布罗德福音书》（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3. 698年前后耶稣化身的缩写，摘自《林迪斯法内福音书》（藏于大英图书馆）。
4. 870年前后的加洛林手稿插图，《圣保罗圣经》，约870年成书。

# 前 言

“中世纪开始于地中海古代文明趋于消亡之时”这类枯燥的说教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灌输给孩子们，使他们牢记在心。我们开始追溯这段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对此有个说法。瓦莱里 (Valéry)<sup>①</sup>赞成所有的文明都要消失这样的观点，皮加格诺 (Pigagnol) 声称，“罗马帝国被杀死了”的论调实在不可取。文明并没有消亡：当文明成长老迈时，也成熟起来，并转变为另一种文明。从秘鲁到里奥格兰德<sup>②</sup>，西班牙火枪屠杀的美洲人的文明还在，其证据仍然顾盼着我们。无论是在路易斯安那或桑比西河<sup>③</sup>，尽管其人民被残暴地卖身为奴，其文化资源被大肆破坏，但不能说黑非洲文明已经从现代世界消失了。近东、印度和远东文明尽管惨遭征服者的蹂躏破坏、抢劫压制，也都同样没有消失。我们自己的文明虽然被定性为西欧文明，但是中世纪的人或法国大革命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这个文明目前的样子一定会感到惊讶。17世纪那些将克洛维 (Clovis)<sup>④</sup>和查理曼划入上古历史的学者比其19世纪的后人持有更清晰的历史连续性的观念。

## 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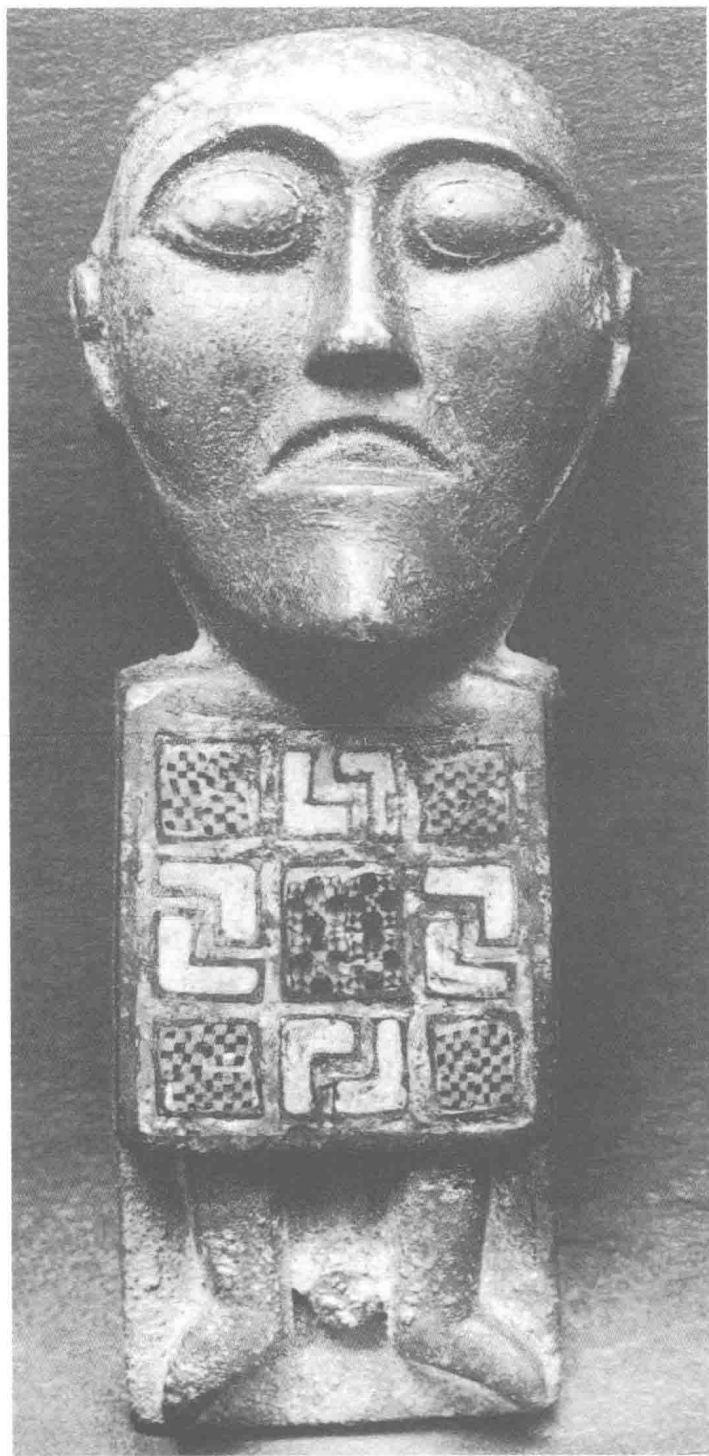
问题是要了解转变从何时开始。350年到450年间可以被视为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转变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是否有某个转折点，即我们跨过中世纪门槛的转折点？我们最好以提出当时人是否意识到他们生活在转变时期这样的问题来开始讨论。当时人的作品（并非所有作家都那么出色）使人产生两个被反复谈论过的印象。首先，他们无意中透露出一种惰性和无所作为的观念，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他们一直处于被统治机器压制的方面，抱怨罪恶横行、滥用权力、人世不公，叹息命运无常、世事难料。他们幻想迷恋于抗争甚至起义，以为这是悬壶济世拯救社会“危机”的良方。我们根本不必怀疑，他们始终抱定一种一贯的凝聚力意识，这种凝聚力把自不列颠到叙利亚的那些最富有的人结合在一种共同文化，即利益相近、有着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文字的群体中。而在我们几乎确信他们坚持这一思想的同时，他们又像主教或演说家一样，始终强化“革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尽管这一点不是其主要抱怨的内容，但他们始终感到处于

① 保罗·瓦莱里 (1871~1945)，法国诗人、文学家和批评家。——译注

② 巴西海港。——译注

③ 非洲河流。——译注

④ 法兰克王国第一任国王，墨洛温王朝创立者。——译注



外族包围之中。那些外族人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住房和雇佣劳动的机会。但是他们对那些人的习俗和饮食感到陌生和厌恶，克莱蒙特主教西杜尼乌斯 (Sidonius) 就把其门前台阶上的哥特人说成身上发着葱臭和油脂腐臭气味并常来打搅他的人。任何人都不能确定入侵是从何时开始的，可能在250年或最晚在300年前后，但是一直存在着一种意见，认为入侵一定能很快结束。这些清楚表示出来的情绪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某些20世纪的观点，使得人们把自己面临的局势等同于处于“入侵”时代的罗马人所面临的局势。这种说法显得相当有诱惑力，只不过当下的入侵是从南向北，而不是从北向南。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对古人做了很多分析后，可能会比那时的人对两种进一步的现象更加注意，先人们对此可是很少提及或根本不相信发生了变化。那时上古统治机构不断丧失其控制力，国家的车轮在前进中逐渐变得步履沉重，公众权力正在让位给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明显的。只要我们想到高卢、不列颠或西班牙，甚或伊里利亚或非洲，这些地区分界的标志被认为都还处于“帝国权力”的保护伞之下，上

发现于米克雷博斯塔德的挪威人墓葬，8世纪末制作的青铜珐琅人像（藏于比利时历史博物馆）。





墨洛温时期的石棺，发现于法国维埃纳地区的西沃，其古墓陪葬品（如武器、珠宝和纺织品）反映了日常生活、手工业制作、生活品位，乃至信仰。古物的来源还提供了商业网络的信息。

述结论就是明显的。进而打动我们的是罗马人传统的目标也已经改变了，此时很少有人再谈论守住边界，即保卫文明的界限和公民参加军队的限制，甚至出现了蜂拥进帝国的新民族高声喝彩的声音，那是被自由往来跨越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阿特拉斯海峡<sup>①</sup>的新居民带来的。对罗马人感到受外族围困的陈旧心态最不屑一顾的人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皆为兄弟。更贫穷的民众和抱着“革新”愿望且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此时正在通过这些没有出身背景的外族人转变为士兵、农夫、工匠或“佣人”。当然，外族人的“入侵”有时具有大规模的暴力性，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编年史学家们，至今仍然混杂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但是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开始于3世纪中期的一两次小族群的入侵，“人口迁徙”这个术语倒是更为接近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主张社会性质变化论者提出的第三种观念也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他们用这种观念诠释的完全是别的东西：即是说文化的、政治的——有的人甚至大胆地提出所谓经济的——“倒退”在

<sup>①</sup> 直布罗陀海峡的古代称呼。——译注



罗马化的“野蛮人”：汪达尔酋长之子斯提里克成为皇帝塞奥多西（379~395年在位）手下的罗马军队总司令，在打击意大利的西哥特人领袖阿提拉的战争中获胜（藏于意大利蒙扎教堂，象牙制品）。

这些“外族人”即“野蛮人”（这个称呼早就被认为是个贬义词了）入侵之前就出现了。一些寻求凯尔特人复兴的法国狂人仍旧认为罗马衰亡是值得庆祝的；而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可能对罗马的衰亡深感悲哀，但是也更加注意转变的渐进性；德国人当然对此表示认可。也许我们应该专注于更为纯粹的历史事实，这样就不至于落入那些众所周知充满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陷阱和错误。诸如使用共同墓地、允许通婚和修改法典这些事实都是逐渐地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的结果，可能仅仅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只有认为两个世界的居民在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都处于平

等的基础上，这些事实才可能得到解释。有人会反驳说这类事情在东欧没有发生，但史实的不同之处只在发生的时间不同。稍后，随着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入侵，东欧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无论如何，谁会争辩说西伯利亚大草原的艺术可以与希腊文化相媲美呢？最后应该提到，抵抗一方已经囊中羞涩，无论他们是否还存在，他们已无任何固守的能力；而此后我们要说到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了解这一点，他们都是感受到中世纪新生活的多数人。

## 选择起点的难题

由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都必须解决，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调查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以便从中找到可能存在的断点。例如，我们关于人口数量知道些什么？其变化的幅度是完全不可能精确估计出来的。但是，依据逻辑推理，即“印象”和天气的种种可能性，学者们越来越相信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受到长期严重的干旱影响，伴随着同时出现的饥荒、疟疾和瘟疫，疾病严重地影响了南部沿海各民族、各地方的活力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再往北，温暖的天气使居住在原始森林和大草原的民族向南迁徙。边境劫掠者曾是自由劳动力的来源，停止劫掠和开始征服就导致从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地区招募吸收了许多移民劳动力，这也为“入侵”的正当性做了辩护，并提供了关于其特点的许多记述。但是，这些类似的事件是否同样出现在东欧却无法确定，或者所有的事情还远不明朗。另外，在这些讨论中，到底在哪里可以划下一条线？还是让我们关注“入侵”的原因和背景，而不要试图确定精确的年代吧。

我们也把文化变异问题先放在一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使学界精英备感悲伤的拉丁文化衰亡和希腊文明败落，因为确实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希腊古代艺术的衰败和古代纪念物的毁坏。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种衰落的趋势和哀叹并不是后来新出现的，至少倒退到2世纪时就产生了。价值判断在艺术和文学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不值得相信，因为它们主要依赖于个人的口味和观点。人们究竟如何确定那个诸多作品和思想源流不断从3世纪的乌尔班（Ulpian）<sup>①</sup>时代传到6世纪的《民法大全》的时代呢？

宗教问题会使我们暂时停下来谈一谈。从罗马世界产生的两个世界，后来又有伊斯兰教构成的第三个世界，都是一神教的，并在伟大的上古东方宗教礼仪中有其根源，这一点难道不重要吗？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推动了这一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变革。就让我们关注一下基督教吧。上古晚期的历史学家们对它可是看法不佳，其博爱仁慈非暴力的训诫说教和对人世的藐视肯定败坏了当时人的公民观、爱国主义和尊重法律等观念，并作为行政司法的对立面，以普世的名

<sup>①</sup> 3世纪罗马法学家，其法学作品对查士丁尼主持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影响极大。——译注



赫鲁尔·奥多亚克 (约 434 ~ 493 年), 帝国军队指挥, 476 年废黜罗穆洛皇帝, 并将帝国权标送交皇帝泽诺, 西部帝国因此终结 (藏于大英博物馆)。

义向野蛮人打开了大门。假定不管会引起多大争论, 我们都接受这种断代的观点, 我们仍然没有确定这种新宗教何时取得了最终胜利? 不同意识形态何时完全融合在一起? 如果这样断代, 我们将会看到东欧陷入大量地方性神学教义的争论, 这些争论后来大体上演变为造反和叛乱, 而伊斯兰教在大多数情况下因此获得发展。在西欧, 我们还必须在更晚近的, 至少要等到在8世纪或9世纪时的公墓里才能找到历史的见证, 因为这时天平才倾斜到这一正统信仰方面来。那么, 我们能追溯到一开始, 例如325年君士坦丁皇帝 (Constantine)<sup>①</sup>在尼西亚正式举行的第一次基督教主教大公会议之时吗? 这完全可能, 那时罗马帝国已经令人惊奇地从“三世纪大危机”中恢复过来, 呈现出繁荣昌盛、元气未伤的样子, 但是这并非中世纪。这正好像是追溯到3世纪末戴克里先 (Diocletian)<sup>②</sup>统治时期对基督教徒的大迫害一样。

政治事件曾极大地吸引了前几代学者的注意力。他们过去确信现在仍然确信政治事件才是编年史不可更改的标志, 这是公认的, 而我们现在对此只是给予次要的关注。对政治事件的选择相当宽泛, 因为它们被刻意地当做象征的而非政治的年代标志。这样做丝毫没有降低我们面临的困难程度。我们如果以395年塞奥多西 (Theodosius)<sup>③</sup>之死作为中世纪的起点, 依据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标志着罗马帝国作为单一实体的结束, 并因为这是帝国由单一皇帝进行的最后一段统治。那么谁能预言这种局面再也不会出现? 尤其是当时的蛮族领袖在476年将西部末代皇帝赶出罗马城后, 立即遣使节把帝国权力的标志物权杖送给在君士坦丁堡的泽诺 (Zeno) 皇帝<sup>④</sup>, 正确地说, 罗马帝国的统一重新恢复了。那么, 是否存在着把476年当做中世纪起点如此关键日期的可能? 当时真的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件事情, 东部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 (Justinian) 还在50年后派遣其大军占领了罗马, 当做其本人亲自到访的陪都。往前追溯到337年皇帝君士坦丁去世, 或向后追溯到西部帝国最后一位合法皇帝马尔左利安 (Marjorian, 457~461年在位) 统治时期, 或两者中间的378年最后一支自我标榜为“罗马的”军队在多瑙河南部地区的亚得里亚堡被彻底

① 罗马帝国皇帝, 324年至337年在位, 统治期间大力推行支持基督教的政策。——译注

② 罗马帝国皇帝, 284年至305年在位, 统治期间实行多项改革, 并迫害基督教徒。——译注

③ 罗马帝国皇帝, 379年至395年在位, 去世前将帝国一分为二, 分由两子统治。——译注

④ 东罗马帝国皇帝, 474年至491年在位。——译注

摧毁，难道这些事件随便可以抓来当做中世纪起点吗？当然，人们可以任意选择其他一些标志性事件：如410年阿拉里克（Alaric）对罗马的洗劫引起整个帝国痛苦的叹息，使得圣杰罗姆（St Jerome）<sup>①</sup>在遥远的东部帝国其隐居小屋中痛惜流泪；425年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sup>②</sup>编纂了《上帝城》一书，他在该书中开始蔑视人世间的“城”；510年克洛维实行王权“统治”法兰克人，等等一些其他年代。由于这些事件的确不是新奇的事件，也不是决定性的标志，所以很难把它们作为中世纪起点。如果以“入侵”为起点，人们也可以或多或少随意地从大量事件里挑出一件来。自270年狄修斯（Decius）<sup>③</sup>批准法兰克人定居莱茵河南部地区开始，到600年前后斯拉夫人逐渐定居巴尔干半岛为止，其间出现了诸如406年蛮族偶然越过冰冻的莱茵河和453年阿提拉（Attila）<sup>④</sup>死亡这类事件，如此一来选择面就变得更为宽广了。

我们还有一些显然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事件要讨论：奴隶制的衰退、农村“庇护制”的加强、城乡联系的中断、“中等阶级”的消失、疆界的变动、贸易重新转向东方、东西欧发展日益不平衡、国家权力与统治者世袭制的混合。这些是更贴近我们研究主题的重要方面。然而，我最初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中世纪是上古时代自然发展的结果，在330年至360年间的4世纪中期中世纪尚未开始，而在460年以后中世纪已经明确地来临了。

### 持久的特点

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我们弄清了或至少显示出一条连贯的线索，在任何方面都不存在突发的、界定分明的或彻底的变革。我们在这个充满迷雾的领域进一步深入探讨问题时，就能够区分持续保持下来的特征、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特征和几近消失的特征以及那些新出现和料想不到的特征了。

暴力以及对暴力长期的崇拜表现出最惊人的持久性特征，它们一直伴随着人类道德观念而存在，成为政治控制的手段。罗马时代关于充满公众精神的公民军队的理想很久以来一直习惯性地受到赞扬。这个军队是由倡导罗马和平的农民组成，与以无视国家、聚众成势、割据独霸一方为解决争端手段的军阀匪帮恰成鲜明对比。这种观念深刻地植入人们集体主义的意识中，那些崇尚上古时代的人对此大加鼓吹：而像斯西比奥（Scipio）、恺撒（Caesar）和图拉真（Trajan）<sup>⑤</sup>这样的

① 347年生，419年或420年卒，对圣经翻译和修道制度建立多有贡献，被尊称为“教父”。——译注

② 354年生，430年卒，基督教神学体系奠基人，著述甚多，《上帝城》为其代表作。——译注

③ 罗马帝国皇帝，249年至251年在位，统治期间以主要精力处理外族入侵问题。——译注

④ 匈奴王，434年至453年在位，率部入侵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希腊、高卢和意大利等地。——译注

⑤ 斯西比奥（公元前185/184～前129年）为罗马著名将领，指挥第三次布匿战争，占领西班牙。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原为罗马将领，征服高卢，后任执政官和终身独裁官，控制罗马权力。图拉真为罗马帝国皇帝，98年至117年在位期间大举扩张，发动长期的东方战争。——译注

一些声名远扬的英雄其实就是可怕的抢掠和大屠杀的制造者，这一点却很快被遗忘了。人们竟让塞涅卡 (Seneca)<sup>①</sup> 的哲学演说蒙蔽而无视他使用奴隶。人们还故意忽视角斗士、竞技场上的“比赛”、暗杀造成麻烦的对手、禁卫队兵变、雇佣兵拥立其同行里的一个文盲登上皇位，正像人们无视军事叛乱和策划阴谋的卑鄙行径一样，这些就是整个罗马史，或确实也是希腊史的重点。那些在图尔主教格列高利 (Gregory of Tours)<sup>②</sup> 时代以战斗到死为消遣的人，或是那些伊拉克略 (Herakleios)<sup>③</sup> 以前时代以宗教的名义割断他人喉咙的人，都被认为是“罗马人”而非“野蛮人”。崇尚暴力和赞赏勇武并非是随着沃坦 (Wotan) 和米柏隆 (Mibelungs) 信徒<sup>④</sup> 而出现的。人们也许会说，这些特征在那些不得不与南方沙漠严酷环境斗争的民族和那些辛劳地耕种土地的北方民族中都是可原谅、可理解的，而这些新来者因生存需求而成为战士。然而，谁能判断大碗豪饮新鲜马血和把奴隶发配到古典战船上去，或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到底哪一行为更好些呢？

这个社会还有另一方面与上述问题有些关联，尽管这里不产生道德问题，但似乎强调的还不够：即人的流动范围问题。这一看问题的方法可能显得令人奇怪。我们世界的图画就是由城市、与土地相关的“农村”和永远存在的道路构成的。像马尔左利安晚到460年时颁布的法律仍力图把人们束缚在他们的村庄里和职业中。日益严重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更紧密地聚集在一家之长、主人或军阀周围，这与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一样。法律条文将当时边疆两侧的居民分为各自的部落或其家族。就此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但是有两个因素被忽略了。其一是紧急事态和危机关头，如战争、经济压榨和官僚机构极度盘剥所造成的类似动乱，迫使人们逃亡。他们一旦离开家乡就将沦落到流浪和没有安全保证的境地，这在几个世纪里都是每一个人面临的命运。为了逃避正在临近的阿拉曼人 (Alamans)、撒克逊人 (Saxons)、波斯人 (Persians) 和汪达尔人 (Vandals)，人们从贝尔吉卡 (Belgica) 逃往普罗旺斯，从威尔士逃亡到阿莫利卡 (Armorica)，从叙利亚远逃到滂都斯，从阿非利加逃到西西里<sup>⑤</sup>。人们沿着公路发现的许多埋在地下的3世纪或4世纪的珍宝窖藏就证明了这些仓促出逃并且一去不复返的事实。另一方面，饥肠辘辘的劫匪强盗大肆洗劫农村甚至威胁城镇，非洲地区的“马匪帮”和高卢的“古巴达匪帮”似乎也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抵抗的风气。在人们认为的所谓统一罗马帝国的表面之下，不断积聚着社会瓦解的力量。

① 罗马哲学家、演说家，生卒年为公元前4年至公元后65年，其大量作品流传后世。——译注

② 都尔主教，538或539年生，卒于594或595年，多有著作传世，《法兰克人史》为其代表作。——译注

③ 东罗马帝国皇帝，610年至641年在位。——译注

④ 均为接受基督教以前的日耳曼人早期原始信仰中的神祇。——译注

⑤ 贝尔吉卡地区位于今天意大利北部。普罗旺斯地区位于今天法国南部。威尔士位于今天英格兰境内。滂都斯为黑海东南岸地区的古称，位于今天土耳其东北地区。西西里为地中海西部岛屿。——译注



高卢-罗马式镶嵌画  
“长工”。两个奴隶正在  
设法抬起榨油机（藏于法  
国国家古代博物馆）。

直到相当晚近时，普遍的看法还是认为，相对而言，由普通的农夫和城市商人构成的世界，与游牧民和游耕农定居的边界以外的世界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游耕农们开垦耕种土地，过一段时间再迁徙到别处去。农业考古学家取得的突出成就已经表明，揭示这一传统历史图景的必要性。不仅在像弗里西亚（Frisia）和德意志中部这些处于原始自然状态的非罗马化地区，而且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西部、英格兰、高卢和雷蒂亚（Rhaetia）等地区，这些定居区刚刚形成或尚未形成，开垦耕作的形态经常变换，农田也难以辨别，尚未形成随后本应出现的耕作田地的形式。我们自然而然会注意到某些定居点：农村，人们在那里保存了墓地，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至今还在使用。当然还有人口集聚的城镇，无论田地是否曾经划分为棋格样式，这种现象越往南部和东部越明显。由于我们对紧紧环绕地中海的这个地区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因此采用传统描述是比较明智的。

显然，奴隶制还是基本的生产模式。尽管这一说法常常遭到反驳，但这种制度也同样在撒克逊人、哥特人和斯拉夫人中流行，在更南部的地区也没有被放弃，虽然那里喂养家畜困难重重。教会虽然提出了一些不满，但是由于它把劳动当做一种惩罚，因此没有采取什么建设性的措施。奴隶经济因而持续不绝，并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结果：技术停滞、专门技能缺乏、劳动无差异、效率低下、暴乱威胁和杀戮。所以，这种在上古时代长期保存的生产模式一直存在着。

人们很容易将城市和其辖区，即上古城市，比做典型的希腊罗马社会，并据此得出上古城市的消失标志着中世纪开端这样的结论，特别是如果接受了城市、城市生活方式和目的不能为新来者所适应这种观点，就更容易赞同这样的看法。下面我们还要提到对这后一种观点的不同看法，但是史学界最近一再表明城市消亡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城市持续衰败缩小，在城市控

制的周围农村郊区出现抢劫，但是城市仍设法生存下来并保持繁荣，甚至在高卢和不列颠或德意志边缘地区、阿拉伯或柏柏尔人的世界里也是如此。这些城市，除了东欧的城市外，就其功能、市容和政治及经济重要性而言，毫无疑问都很少能与其古代的前身相媲美，然而我们这里要探讨的是变革而非继承。我们应该完全同样地强调，税收系统很难在农村有效地运行。农村限制了城市的活力，驱散了其中的居民，缩小了它们的权力；城市除了动乱骚扰就是居民逃亡，在中世纪早期的地图上还继续保留着一些城市确实令人生疑。

如果把希尔佩里克 (Chilperic) 或里卡雷德 (Reccared) 说得与伊拉克略没有根本区别的话，那么侯斯罗伊斯 (Chosroes) 或瓦伦提安 (Valentian)<sup>①</sup> 就将使所有罗马文明真正的追随者感到震动。是的，区别只在于规模和范围——其权力的性质仍然相同。国家很久前早已不属于全体居民所有，此时它只为君主们所有。的确，他们甚至没有像墨洛温君主利用教会弥撒圣别式，或像西哥特人一样，利用神灵的预兆来提升自己凌驾于其野蛮同胞之上的地位。无论权力来源于太阳神、琐罗亚斯德<sup>②</sup> 或基督教的上帝，权力都依赖于神灵和神祇以保证其管辖权和立法权。权力就是领袖魅力和人格结合的武力。它是世俗和宗教力量的结合，举凡公共土地和国库以及士兵和被保护人等所有隶属于君主的事物都变为其个人所有。在罗马人没有接触过的撒克逊人或其威信介乎于可恶和怪诞之间的墨洛温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对民众的强烈感情，存在着尊崇法律的情感，比波斯君主和有幸登上拜占庭皇位的士兵们表现得更强烈，因此如果权威的基本含义没有改变，那么谈论西方政治贫血病似乎是不大合适的。伊涅 (Ine)、达格伯特 (Dagobert)、塞奥多里克 (Theodoric) 能够与查士丁尼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莫里斯 (Maurice) 了<sup>③</sup>，因为他们抱有对现存道德秩序同样的偏见，他们同样依靠其周围的亲兵，也的确同样依赖于武力。只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即在东部长期存在的埃及各省份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混杂着呆板僵化残酷暴虐的统治方式，制约或摧毁了任何创新的努力，这的确是没有什好炫耀的。

## 消失的标志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两个深入考察中世纪的坚实立足点。同时，由于这些立足点存在不足而使其他标志凸显出来。最明显但也产生了许多细微差别和变化的标志是，已经分裂为两半且

① 希尔佩里克为法兰克墨洛温朝国王，539年生，584年卒，561年至584年在位。里卡雷德为西哥特国王，587年放弃阿里乌派信仰，接受基督教正统信仰。侯斯罗伊斯为波斯国王。瓦伦提安为罗马帝国皇帝。——译注

② 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传说人物，为神的使者，拯救人类。——译注

③ 伊涅为威塞克斯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688年至726年在位。达格伯特为法兰克国王，629年至639年在位。塞奥多里克为东哥特国王，489年至526年在位。查士丁尼和莫里斯均为拜占庭帝国皇帝，分别于527年至565年和582年至602年在位。——译注



残破不全的罗马帝国。人们很快就不能从克莱蒙特（Clermont）往尼西亚寄信了，或者不能从约克旅行到希波（Hippo）了<sup>①</sup>。毫无疑问，一直存在着共同历史的观念，在帝国西部，笃信自己是“罗马人”的“蛮族”也欢迎这个观念，但是社会的上层，即那些富有和有文化的人正在丧失其统一连贯性，他们的产业如同其友谊和追随者一样一度遍布地中海世界，此时被迫更关注各个地区的利益。由于与我们直接对话的实际上只是这个阶层，我们对他们的悲哀必然深表同情。罗马的世界主义确实蜕变萎缩为概念范畴或社会上层的回忆。这种观念把征服教会的全部努力变为承认其教徒团体的存在，其影响扩展到罗马帝国自身以外，并被视为一场精神上的胜利，实际上是智力残缺的失败。

关于这个被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sup>②</sup>比喻为“上帝出血点”的巨大历史创伤的物质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确实存在着帝国西部需求扩大和其贸易供应缩小之间矛盾的证据。甚至在那些保存了大部分城市中心的地区，如高卢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与帝国东部的联系也不太密切，因为城市居民因为需要保障其不可或缺的粮食供应，显然更依赖于大地主而不是依赖于来自叙利亚的商人。无论是元老贵族还是蛮族贵族继续保持他们喜好奢侈的饮食和豪华的生活传统。人们可以断言贸易平衡和收支平衡的情况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帝国西部的贸易平衡此时变得更不利，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发展，更加严重。人们也许对农村地区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可以确信那种开垦而后弃耕的定居形式此后成为规律，而未经开垦的荒地、罗马人的牧场、公共或非公共林地，此时都被开发成为另一种初始生态环境的样子，但是考古学尚未就此提供出充足的证据：它只能证明在2世纪大部分被耕种的大地产和甚至在3世纪危机后重新恢复的土地，在400年至600年的时间里被弃耕了。那么它们是被什么取代的？是扩大的村落？还是遍布这些土地上、采取集体耕种的小村庄？或是分布在人数众多的有地公民中的农舍（茅屋）？或是这三种形态的混合形式？当生存空间被迫留给入侵的新来者时，国家强迫这些土地主人接待新来者共同生存的确切性质是什么？是分区？还是分裂？对于这个基本问题，还存在相当多的未知，但是大体的轮廓还是相当清晰的：城镇在萎缩，反映在农业结构的重建。可能农村社区其他方面也在重建，显示出农村变得更加重要。

最后，在另一个层面上看，这个立足点也几乎不存在了，特别是在帝国西部，这更加剧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多种矛盾冲突。罗马帝国各个行省是否真的制定和推行了土地注册簿和税收计划，这主要还是个学术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可以确定的是，西部帝国分裂为小君主统治下的诸多实体及其通常同时出现的地方领主，而东部帝国在理论上形成集权政府对原有的和刚被征服的省

① 克莱蒙特位于今法国境内，尼西亚位于今土耳其境内，约克位于今英国境内，西伯位于地中海东岸。——译注

②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生卒年月为1886年至1944年。——译注